

Suibi Jingxuan

随笔

2018中国年选系列



2018年 中国 随笔精选

中国作协
创研部
/ 选编



贰 零 壹 捌

2018年 中国 随笔精选



贰 零 壹 捌

中国作协
创研部
/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8 年中国随笔精选 / 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1
(2018 中国年选系列)
ISBN 978-7-5702-0611-7

I. ①2… II. ①中…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7919 号

责任编辑: 马 蓓 陈 聪

责任校对: 陈 琪

装帧设计: 壹 诺

责任印制: 邱 莉 王光兴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7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67 千字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编选说明

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诗歌选和随笔选六种。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

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霍俊明同志负责；

随笔卷由纳杨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目 录

文化视点

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 / 陈众议	003
国际视野下的乡村写作 / 蒋好书	016
打捞乡愁的团队 / 郭文斌	027
人，生活于看不见的关联中 / 安黎	032
城市笔记 / 陈元武	034
人机交互与智能的思考 / 白驹	040

光影流年

回头是岸 / 熊育群	053
香烟的故事 / 张新颖	064
出租车上 / 保剑君	068

人文地理

半岛渔村手记 / 张炜	081
三朵 / 叶梅	096
可可西里的生灵 / 曹谁	101
林地居民 / 苏莉(达斡尔族)	113

骑行笔记 / 存朴	129
汤显祖及其同好与小河驿 / 任轩	137

生命情思

三道门 / 易新琴	147
提灯的人慢慢走 / 梅玉荣	152
处暑开花不见花 / 蒋蓝	156
观鹤记 / 罗张琴	164

人物影像

衡文玉尺 不老雷达 / 高洪波	173
茱萸的孩子已作逍遥游 / 梅子	175
世间再也无傅雷 / 远人	180
燃烧到最后一刻的写作者 / 阎晶明	185
传奇高深 / 佟明光	188
古调独弹 / 孙郁	193
疾虚妄(节选) / 胡竹峰	211

艺苑撷英

茨威格和《陌生女人的来信》 / 麦家	221
屹立在三角平衡点上的小说教材： 《包法利夫人》 / 毕飞宇	228
绘画中的手 / 汪民安	241
时间的魅影 / 唐棣	251

智慧之门

六十年后观我记 / 贾平凹	269
故事里的故事 / 蒋子龙	271
主观书笔记 / 闰文盛	287
城市与文学的韵味 / 阮直	293

文化视点

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

陈众议

托马斯·曼在逃离纳粹德国、登上前往新大陆的邮轮时，忽然想起了那个著名的问题：如果将你送到一座荒岛，且只许你带一件物品，你会选择什么？而当时曼的手提箱里除了少量衣物，仅有一套德文版《堂吉诃德》。

那是一九三八年的春天，《堂吉诃德》陪伴了曼的整个航程。最后，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三月二十九日：我梦见了堂吉诃德。他是活生生的一个人，数日里和我促膝长谈……他和我一样谦恭友善，而且充满了难以名状的热情。于是我想起了昨天的阅读：‘我已经不是从前的堂吉诃德·德·拉曼恰了，我现在是好人、善人阿隆索·吉哈诺，在家受人尊敬，外出也人见人爱。’于是，无限的悲痛和怜悯、崇敬和思恋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有一种传统，它非常欧洲，那就是怀旧……然而，透过晨雾，眼前渐渐浮现出曼哈顿的高楼大厦。那是一抹神奇的殖民地风景，耸立着一座高塔入云的伟大城市。”

一、童年的味蕾

据曼回忆，《堂吉诃德》是他童年接触到的第一部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我想，他极有可能是受了德国浪漫派的影响。用海涅的话说，“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个个登峰造极……”是的，一开始读什么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能否使孩子从小喜爱经典，然后渐成习惯。无论做什么，一旦成为习惯，也便成了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欲使孩子喜欢阅读，就必须先让他们亲近文学，而且最好是文学经典。所谓“读什么书，成什么人”，经典阅读的确可以培养气质：我们古人管这叫“书卷气”。这其

中自然还有更为重要的情怀。

事实是，曼一发而不可收，并终究激发、成就了他的天才。我唯一不敢苟同的是他关于怀旧的指涉。我以为怀旧同样非常中国，并且是人类共通的情状。尤其是在中国，怀旧与土地、乡情关联，盖因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农耕社会而繁衍至今；用故友柏杨先生的话说，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民族像我们这样依恋故土矣。是啊，从隆古的谣曲到唐诗宋词，我们最美的篇章莫过于思乡怀旧之作。“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温庭筠），等等，等等，延绵不绝，精美绝伦。

回到我们的问题：为什么需要文学？答案可有多种，用时下年轻人的话说或有N种也未可知；但任何一种也许只是我们所能想见的关乎文学的冰山一角。

而我，为了回答这个既古老又常新的问题，不仅想起了曼想起的问题，并且勾起了童年的记忆，因为它也非常文学。

我生于紧邻“三味书屋”的一片老宅，老宅中间有一座八角亭。囿于鲁迅的缘故，那老宅几易其主、几经改造，早已人转物非，没了过去的模样。加之从百草园至大禹陵，绍兴虽小，却出过无数名士骚客，其中既有铮铮铁骨，也不乏圆滑师爷。子曰“见贤思齐”，面对古来圣贤，我等难免自惭形秽。但好处也是明摆着的。作为绍兴人，从小耳濡目染，许多文人墨客的美丽传说无意间化作精神之氧，汇入血脉，真善美、假恶丑不相杂厕。勾践卧薪尝胆，范蠡功成而退，文种视死如归，西施忍辱负重，再加上子胥的刚正不阿、夫差的贪色忘义、伯嚭的奸宄叛国，那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历史剧啊！还有陆游与唐婉的千古情缘，兀自于沈园化作美丽的神话。“错，错，错”“莫，莫，莫”，多么哀婉动人！又或者徐渭的故事：且说怪才徐文长桀骜不驯，茕茕孑立，其所言所行无不被京剧脸谱似的一笔笔勾描、一点点夸大，最终远离了本真，成为传奇。它们活像时下的许多网络段子，谐中有黠，黠中有义，堪称民间文学的一个微缩。倘使将其同《笑林》或《笑林广记》或广义的喜剧联系在一起，那么文学对道统的某种颠覆性便难免令人敬畏。与此同时，从王充、谢安、嵇康、谢道韞到王羲之、王阳明、秋瑾、蔡元培，可谓故事多多，难以尽述。

然而，我想说的是，读书犹如饮食，从小培养的味蕾其实会伴随人

的一生。试想，我等自小吃泡饭、菜蔬，鲜有荤腥入口，长大后对西餐，尤其是奶酪之类的抗拒就非常顽固。留学期间，虽然嘴里不说，但我心里明白，童年味蕾的记忆使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洋人的奶酪了。呵呵，谁稀罕动他们的奶酪呢？！同样，孩时家国贫困，咱新鲜豆腐都吃不上，又怎会让它发酵变臭？！于是，目下遍地开花的臭豆腐我也从来碰。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人之不同，犹如其面；即使性之相近，也还有习之相远、尚之相异。

由此及彼，我始终认为阅读的习惯也是从小养成的。而文学阅读无疑是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最佳门径。这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或可谓文学的最大好处之一）：集形象性或生动性、趣味性或审美性于一身。古今中外，鲜有孩子不喜欢听故事的。人们从听故事，到读故事，再到写故事和讲故事，这是文学赖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和现实理由。若非要将人的心智分作情商和智商，那么文艺显然是人类情商的最高体现。二〇一六年，适逢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逝世四百周年，文化部、国家图书馆等单位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旨在纪念伟大先贤、推动全民阅读。就参加的几场讲座而言，所见所闻着实令我唏嘘了好一阵子。首先，参加活动的听众或观众多为离退休老人和已晋父母的中年男女。归类并包，他们的问题几乎只有两个：怎么才能让孩子喜欢读书？孩子们该读什么样的书？可见他们所来所往十分明确：为了孩子。

我当时趁势借用了塞万提斯的一句名言：读什么书，成什么人。大意如此。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我认为没有比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学经典更有效的了。除却前面提到的两大特性，它们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教化功能也是其他任何书籍所无法比肩的。相形之下，目下充斥的电子游戏和网络快餐其实非常不利于儿童阅读习惯的养成。且不说前者所赋予的感官刺激妨碍儿童亲近相对“枯燥”（有时还比较“冗长”）的文字，即使比较严肃的影视作品也因其不可避免的单向度定格特征而对阅读（文字）的巨大张力产生制约作用。这里还有心理学层面上的先入为主。比方说，《红楼梦》中林黛玉，影视作品给出的只能是陈晓旭或张晓旭、李晓旭，而绛珠仙子在我等蠹书虫的心目中却是说不尽的。恰如后结构主义所夸张的意义延宕或延异。这是语言文学特有的想象力熵值：越是经典，其想象空间越大，熵值越高。莎士比亚之所以说不尽，也是因为“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歌德语）。

二、青年的热情

在国外，较之《红楼梦》，《聊斋志异》无疑拥有更多读者。在这些读者中，青少年大多将女鬼的故事视为恐怖小说。问题是：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女鬼总是爱上书生？哈哈，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写书说书的大都是书生。这有点像脑筋急转弯。但若非要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那么围绕这个做几篇博士论文也未尝不可。

倘说儿童的共同特点是不把游戏当游戏，不把故事当故事（虽为虚构，却非常真实。富恩特斯借矛盾修辞，谓此乃“真实的谎言”）。所谓戏时“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千里，两小无嫌猜”（李白）；学则“幼是定基，少是勤”（洪应明），否则必然白首方悔读书迟，空悲切。

说到悲切，当下最令人忧心的依然是读书习尚的缺失和读什么书的问题。青少年固然精力充沛，求知欲旺盛，好奇心强烈，正是读书的好时候；但应考、恋爱及各种难违之约、难却之情也纷至沓来，每每令其应接不暇。然而，起决定作用的永远是主观因素。童年的味蕾、童年的习惯已经形成，倘使荒废精力、远离书本，那么肯定只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了。

关键在于，少年易学老难成。人活一生，草长一春，人不能事事躬亲、处处躬亲，而文学所能提供的生命情景和生活体验却几近无限：激发彼时彼地鲜活存在的无尽想象，其审美和认知价值无与伦比。这自然也是文学的一大好处。至于青少年火一般的热情，大可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使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小可用“点燃未来的万家灯火”（泰戈尔），或“让小鸟在彩虹上筑巢”（维多夫罗）来想象。

此外，文学不仅是审美对象、认知方式或载道工具，它也是民族的记忆平台，蕴藉了太多的集体无意识，因此还是民族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这就牵涉到语言文学与民族之间那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有人问及丘吉尔，莎士比亚和印度孰轻孰重时，他说如果非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他宁要莎士比亚，不要印度。当然，他这是从卡莱尔那里学来的，用以指涉文学的重要、传统的重要。而语言文学永远是一个民族所能传承的最大传统，也是其向心力和认同感的重要基础。

当然，文学的力量并不局限于本民族。曾几何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使无数中华热血青年放弃优越的生活奔赴延安，奔赴抗日战场。问题是时移世易，如今连自家的“四大名著”都上了“死活读不下去”的榜单（据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抽样调查）：《红楼梦》位列榜首，《西游记》被大话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横遭批判。屈原、杜甫、岳飞以及鲁郭茅、巴老曹的地位急剧下降。呜呼！还剩下什么？张爱玲、徐志摩、周作人、废名、穆时英吗？后者并非一无是处，但若置于彼时彼地、历史语境，那么孰重孰轻不言自明。而目前剥离历史情境，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似乎渐成时尚。呜呼哀哉！

与此同时，文学是多维的，它既可以是柏拉图式的否定性想象，也可以是巴尔扎克式的历史书写；既可以像卡夫卡、博尔赫斯那样哲学化，也可以像乔伊斯那样让你啃去吧！不过作为读者，我们尽可以取舍由己，俯仰任意。谁叫文学是一座摸不着边际的冰山呢？我想海明威在言说冰山理论时，他是极其谦恭的。这理应是所有文学读者、作者、译者和学者（尤其是学者）应有的态度。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创作《百年孤独》之前，做了多年谦恭的读者、记者、学者和编剧。他服膺于《圣经》，服膺于索福克勒斯，服膺于塞万提斯。服膺于十九世纪经典作家，服膺于他的启蒙文学《一千零一夜》，并被鲁尔福所震慑、所折服，如是由衷地感喟：所有拉美作家其实都在奋力写作自己的《圣经》、民族的《圣经》、拉美的《圣经》，只是角度和细节有所不同而已。而我们作为中国读者、中国作者、中国译者、中国学者，也只是文学这座巨大冰山的点虱或点缀。用博尔赫斯的话说，每一种阅读，每一种书籍，都是沙堆中的一粒。甲连乙，乙连丙，循环往复，没完没了。而文学是大脑和心灵的最好延伸，就像汽车、轮船和飞机是腿脚的延伸，枪炮、机床、吊车是胳膊的延伸。

再则，文学的确又是“无用之用”，它一不能吃，二不能穿，三不能住，唯一的好处是茶余饭后聊可平衡道器。该出手时学堂吉诃德，该犹疑时学哈姆雷特。诚然，说到平衡道器，又不免有一个用字，或者拿悲剧医治哀伤、用喜剧自嘲嘲人；又或者陶熔诱掖、熏浸刺提，却难以立竿见影。至于能否兴观群怨，则更要看才华、积累和（话语）力量。再说得功利一点，文学还是民族文字的土壤和硕果，而文字无疑是民族文化的最大传统。其对人类的贡献，大是脱蒙，小谓脱盲。而民族的所有经典，譬如我们的经史子集，皆应中文而在，皆应文学而美。

且说读书的习惯一旦养成，必定终身受益。就各国阅读数量而言，位居前列的以色列便是文学“消费”大国。文学经典老少咸宜，尤其对于阅历较浅的青少年，上可修心明德，中可增才添华，下可消磨时光，权作怡情雅趣或者“心灵鸡汤”。好在青年“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热情四射，希望无限。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有才之人毕竟是少数，是那些有理想、有抱负，而且有毅力、有准备（或天赋）的极少数人；并非所有青少年皆可成才，遑论坐享其成。天上掉不下馅饼来；设若掉得下来，也得起早去捡啊！古人云，勤可补拙，勤可补阙，青春读书犹未晚。想人家萨拉马戈三十岁爱上文学，而后大量阅读；六十岁开始写作，再而后一不小心捧得诺贝尔奖；尽管诺贝尔奖不是衡量文学的标准，更非唯一的标准。反之，爱因斯坦从小喜欢文学，但最终却选择了科学，并视科学为文学的姐妹。可惜他没有认真讨论过文学同科学的关系，倒是在谈论宗教与科学时不经意捎上了文学。他对宗教信仰进行了大而化之的分类与比照，称原始宗教为“恐惧宗教”（神话传说何尝不是恐惧文学？），即人们因惧生教、因骇信教。这与我国古人所谓的“幻由心生”是一致的，而且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以及文学（神话）起源的言说。同时，爱因斯坦认为第二类宗教是“道德宗教”，即人们出于心灵慰藉或终极关怀而催生的信仰（文学何尝不是如此？）。尊重起见或基于抚慰的需要，许多科学家即或不信上帝，也会予以搁置（这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宗教问题的处理，共产党人不信教，却允许党外人士信仰自由）。第三类显然是爱因斯坦真诚拥抱的“宇宙宗教”，那是物质和精神、自我和万物的双重或双向求索，它服从于人类广义的艺术和科学精神，是源远流长的“爱智”思想在现代与未来的延展。它体现了哲学、文学或科学本体论及“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既向内又向外的无限诘问与探询。后者是由画家高更最先提出的，它非常哲学，也非常文学。它被习总书记引申为“我是谁”“为了谁”，从而擢升到了更高的境界，一如将王国维治学三论引申为共产主义信仰三境界。

三、成年的反当

成年是收获的季节，但更是付出的季节，你得给别人讲故事了。于是，“书到用时方恨少”，麻烦来了。

就我从事的这个行当而言，作家固可在年轻时一举成名，创作出划时代的“这一个”“那一部”，但学者很难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学术较之创作更具意识形态色彩，也更受制于上层建筑，故而需要更多的阅历和读书等多重积累。天赋固然重要，但学术研究不可能脱离研究对象及其创作肌理、生活环境和文学景态，后三者均可无限延伸至学术史和社会史维度。因此，任何一个课题，都够你恶补一阵子的。随便举个例子，譬如《红楼梦》，你想稍稍靠近它，起码得知道它在乾隆年间还是“诲淫诲盗”之作，自然人不得《四库全书》这等封建王朝的经典谱系（除却诗，实际上戏剧和小说分别被称作优伶之术和稗官野史，不登大雅之堂。尤其是小说，一直要到维新变法才开始获得正名）；循着“维新变法”的滥觞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它才拂去历史落下的尘埃；而且经由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胡适等，开启了经典化过程。

说到经典，我知道这又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课题。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说了经典的许多好处，却始终没有明确指认何为经典。自然，反过来说，经典的好处本身成就了经典，譬如它可资反复阅读，它具有多重乃至无限的阐释空间，它可能进入我们的集体无意识，等等。而我想补充的是：一、经典是现时的，也是历史的，但主要是现时的；二、经典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但主要是民族的。

先说第一点。有关证据多多，譬如近现代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浪漫主义思潮。文艺复兴运动是一次经典重估，浪漫主义思潮亦然。前者凭借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和新柏拉图主义对喜剧的拥抱，颠覆了在古希腊—罗马占主导地位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于是，酒神精神使喜剧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首要体裁，而宗教神学的广厦在成千上万喜剧观众的嘎嘎笑声中轰然坍塌。但浪漫主义对悲剧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青睐再一次改变了文学的发展向度，悲剧精神被再次唤醒，莎士比亚悲剧、塞万提斯小说被重新发现并定于一尊。后来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固然更为复杂，但文学这个由文与学组成的偏正结构犹如一枚钱币的两面，一而二、二而一，孰因孰果通常很难截然区分。都说二十世纪是批评的世纪，但实际上文学创作同样风起云涌，相对的绝对性（如客观真理）被绝对的相对性所取代。于是，人们言必称模糊，言必称不确定。于是，颠覆了庄严，消解了崇高。这对谁有利呢？也许是资本吧。谁吆喝得响，谁手里有钱，谁就是文坛老大。于是，文坛变成了证券市场。

总之，尽管鲁迅称文学最不势利，而且他对东欧作家的情有独钟证

明了自己的说法，但时有偏侧，人有好恶。随着浪漫主义理想的破灭，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将矛头指向了资本（就像大司铎鲁伊斯和莎士比亚对金钱的口诛笔伐）。巴尔扎克堪称其中的佼佼者，马克思、恩格斯对他褒奖有加。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将现实主义定格在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个典型环境已经不是启蒙时代的封建法国，而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的“自由竞争”（马克思语）。这时，资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此，我们不能以简单的反本质主义否定事物的基本属性、社会的基本状态和历史发展趋势。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批评这位工人作家说：“我绝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的意思绝不是这样。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这是就马克思所说的“席勒式”和“莎士比亚化”所言的。恩格斯同时指出，“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那便是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这样，巴尔扎克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恩格斯所说的这些人就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表的“人民群众”。较之法国封建贵族，资产阶级的确代表了更为广泛的人民群众，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保证。

但是，近一个时期巴尔扎克被悄无声息地边缘化了。和巴尔扎克一样，托尔斯泰在我国命运同样堪忧。究其原因，除了西方所谓的意识形态“淡化”，恐怕还有我们的自我放逐和盲目（与西方）趋同、向资本投降，等等。

且说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褒奖具有鲜明的国家意识和阶级立场。套用恩格斯的话说，那是因为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一文中，列宁认为托尔斯泰表现了俄国革命的特点。因此，他的矛盾是俄国农民的矛盾。由此，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再说第二点。譬如前面说到的《红楼梦》，它的经典化过程是在二十世纪初完成的，且远未成为世界经典。这多少与国家的实力和影响力有关。在外文所邀请的多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唯邻近的大江健三